

毛泽东思想在一个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

梁化奎

[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是在极端残酷而又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它与其间推进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等问题同生共构。其集体行为的大方向与集体情感强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程迅速变化发展中的总形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为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并对其后中国社会和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 中共建党纪念 话语表达传播

[作者简介] 梁化奎,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传播中,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程(1936—1949),深具大党课性质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共建党纪念文本,构成了一个重要话语地带。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话语地带是怎样被表达传播的,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集体情感强度;这一表达性历史行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管窥考察。

一、从称誉领袖毛泽东到呼之欲出的“毛泽东思想”

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可

以有多方面的条分缕析。从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地位是怎样首先在中共党内被接受认同的,来揭示叙述问题,理应是个可选的切入点。

关于中共党内对于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地位的接受认同问题,现在党史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延安整风前或至少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言论和举措”,“毛泽东的文章和言论也没有引起特别重视”。^①然而析读发端于全面抗战前后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的文本话语就会发现,1936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莫斯科举办首次

^①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第1卷,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中共诞辰纪念活动时,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就已响亮地出现在当年的文本话语中了。作为被言说的领袖,毛泽东的排名不仅总是位列首位,而且被视为是“最敬爱的”、“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苏维埃的、红军的优秀领袖”^①、“举世共知的”、“天才能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② 这年2月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建议,在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出版“毛泽东、朱德、王明、周恩来等同志的单独文集”^③。其后几年,中共建党纪念文本话语中对于毛泽东在党内身份、地位的提法,基本上也就沿袭了首次建党纪念活动中的言说模式。1938年7月1日,八路军后方各留守兵团军政首长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贺电中,就把毛泽东、洛甫、王明、朱德等同志并称为党的“贤明的领袖”^④。

上述言说模式到中共成立19周年时出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变化,就是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中当“领袖”一词加诸于毛泽东之时,不再同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俱名出现而有了排他性的政治特征。这年,朱德在说明党在建军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的纪念文章中,讲到毛泽东在创建这支“铁的军队”中的作用时,指出它得到了“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心与指导”^⑤。当年延安街头也到处可以看到“敬祝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健康!”的鲜明标语。^⑥ 出现这一变化实非偶然。从毛泽东在1936年底至1940年初发表的言论文章看,《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收录的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就有10余篇,70余万字。像《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当时在党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对于描绘了未来新中国蓝图、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党史权威论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有这样的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

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⑦ 这表明这时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话语建设者的权威形象已在走向丰满和成熟。

更重要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话语的重构过程,与中共建党纪念话语据此所作的阐释性表达传播过程,也是两个交互性影响因素渐进累积与转化的过程。即中国革命从“俄式革命话语模式”向“毛式革命话语模式”的累积与转化,与毛泽东从一个革命话语建设者向革命话语权威的累积与转化。从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看,这样两个“累积与转化”当潜行至20世纪40年代的最初两年,其累积溢出效应已经初露端倪。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七一”一词首次出现在了中共中央文献中。这意味着把7月1日定为中共成立的纪念日得到了党内高层的认同。同时,《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⑧。这样,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不仅有了固定的纪念日,而且被扩大推及到了各抗日根据地。这就进一步拓展了纪念话语的传播空间。也正是在这年的“七一”建党纪念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⑨。在此背景下,毛

① 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

② 王明《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2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④ 《各界致中共贺电》,载《新中华报》,1938年7月5日。

⑤ 朱德《中国共产党和军队》,载《共产党人》1940年第8期。

⑥ 《本市各界热烈庆祝中共成立十九周年》,载《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

⑦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⑧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4页。

泽东的领袖形象和地位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中也随之被进一步推高和提升了。一些党的领导人或理论工作者还在尝试着对其文本表述中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力求作出合理的概括和总结。

1941年6月,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纪念中共诞生20周年的指示精神,延安广播电台全文播报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于当年4月30日出版的《解放》第127期上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文中,“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含“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全文共使用了25次。其中,明确指向毛泽东的有20次,而指向列宁、斯大林的仅有5次。6月5日,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八路军各部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及其“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生平”、“奋斗的历史”、“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的学问人格”,并称誉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①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由此拉开帷幕。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纪念中共成立21周年时,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舆论媒体,始而敏锐地把话语转向了对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的建构和传播上。朱德首次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提法。他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②陈毅指出:毛泽东“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③就此他还从五个方面对其作出了阐释性概括。邓拓在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的纪念社论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在21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④进而分述了毛泽东

在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与策略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至此,出现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毛泽东,已不但是个集合法型与魅力型权威结合而成的党的领袖,亦是一个象征符号。它强大而睿智,能被行动者所感知和领会,并被确认为其理论使之有效。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旗帜形象已经在党内初步树立起来了。至于对这方面旗帜的科学命名,也已是呼之欲出了。

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与对其的年度性表达传播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并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借机提出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这种情势反映在中共党内促使其产生了必须凝聚起来的集体期盼。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需要一位思想意识上的领头人”,“这在政治上表现为谁是以后中国的合法性领导者的核心问题;在思想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体系来设定中国的走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言说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话语方式来规范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和行为姿态。”一句话,“时势需要一个说法,需要一个关键词,以此作为言说的主词,造成一面话语的旗帜。这个关键词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则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便成为问题;但又必须是中国的,否则无法应对国际国内的时势”。^⑤这是纪念中共建党22周年时的大背景,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被提出的历史语境条件。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50页。

② 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③ 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七一建党纪念感言》,载《新华报》1942年7月1日。

④ 邓拓《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载《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1日。

⑤ 文贵良《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载《书屋》2004年第5期。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22年的历史奋斗中,已经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①这样,作为一种集体期待,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中共建党纪念话语最终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表述。它以“毛泽东”这个形式符号作前置,后续以具有开放性中国性的“思想”一词,这一有机结合意味着在革命话语的高地上又一新的象征符号因此而诞生了。而其意义和影响从后来党的历史的发展看,已明显超越了当时创造了这个符号的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时空想象。也是在这一年,刘少奇在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提出,应该研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指出: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②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则强调指出:强烈的群众观念,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③

从逻辑上讲,“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后,就有个需要学习以及如何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问题。1944年7月1日,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成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是因为他代表了“党的正确方向”,“而与党的整个事业相结合”;他的思想是“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因此,要“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④中共“七大”结束以后,党内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学习党的“七大”文件结合起来,进而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1945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社论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七大”上表现出了“空前

的团结现象”,“这种团结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于强制而实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已为全党所共同接受,这就是党内团结的思想基础。”^⑤同年6月14日,中共冀鲁豫分局发出“七一”建党纪念指示,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都要举行党员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勇敢、智慧与工作作风”,“以便造成学习热潮”。^⑥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潘梓年在纪念建党25周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共“七大”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以往其他阶段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中国革命已成为更加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了”。^⑦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社论指出“要把一切工作做得更好,对中国对人民贡献更大”,“就更更要善于向毛泽东学习,向群众学习,更要善于把这两种学习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最高智慧的集中,没有这种思想的指导,人民就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社论最后高呼“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中国人民的救星毛泽东万岁!”^⑧1947年7月3日,方方在纪念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最主要原因,还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人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整个学说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⑨这表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中国

①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② 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③ 任弼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④ 罗荣桓《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6页。

⑤ 《民主团结,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载《新华日报》1945年7月1日。

⑥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页。

⑦ 潘梓年《中国共产党》,载《群众》1946年第9期。

⑧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载《解放日报》1946年7月1日。

⑨ 方方《纪念“七一”,学习毛泽东思想》,载《群众》1947年第23期。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政治认知、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态度等方面,其集体行为的大方向仍是以“拥护领袖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心话题而持续推进和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前两年,借助中共建党纪念活动这个平台,党的主要领导人纷纷撰写文章或是发表演讲,阐述宣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七一”纪念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做了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因此,“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毛泽东思想。”^①同日,罗荣桓和林伯渠在各自的演讲中,也都强调说明了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罗荣桓指出“我们党产生毛主席思想是非常宝贵的,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这是从党的几十年流血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应该极其重视的东西。……学习党的路线与学习毛主席思想是不可分离的。”^②林伯渠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现在还正在发展着与完善着的”理论体系。但其中有两点要讲,“这就是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群众需要和觉悟程度决定工作的任务与执行任务的步骤和方法”。^③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还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对毛泽东新提出的经典思想理论的及时回应。如董必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讲话中,就深入宣传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指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好好检点检点自己,有没有在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屈服过。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作风就是我们党的作风。”^④二是一些学者、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开始参与到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传播中。如历史学家侯外庐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称之为“常青理论”,还把毛泽东的“革命战争学的辩证法”思想形象地称

之为“肥美的理论果实”,并从学理上论证说明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联结史”^⑤。1949年7月1日,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在北平“七一”纪念大会上号召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学习”,“用行动来祝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并表示愿以“团结一致”四个字,“献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作为庆贺生日的一份礼物”。^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集体情感及其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自豪地迈上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台阶和红色大舞台的。

三、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毛泽东思想表达传播的特点与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历时性地经历了从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接受认同,到对其学说思想体系的建构和传播,与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后,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程的演进过程。总的来看,它是在极端残酷而又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并与其间推进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等同生共构。它通过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两个象征符号的不断再定义和再诠释,架构起了这一表达传播的一般叙述模式。除此之外,这一表达性历史行动还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它是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为平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年度性活动和历史书写。民主革命时期,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孕育,到这一科

① 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527页。

② 罗荣桓《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③ 林伯渠《学习毛泽东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载《群众日报》1948年8月9日。

④ 董必武《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⑤ 侯外庐《孙中山到毛泽东——为伟大的二十七年历史创作而作》,载《群众》1948年第25、26期。

⑥ 沈钧儒《在北平“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49年7月3日。

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再到它被全党认同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徽章,在这一历史书写中,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传播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在时间上,它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半程,并一年一度地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在地域空间上,它从以延安为中心的局部言说,到遍及各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的广大区域。从参与主体看,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民主党派人士和学者是毛泽东思想最有力的传播者。在这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年度性活动和历史书写的场域,一方面,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传播提供了一个可供反复操演的平台,或者说,它为“拥护领袖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出口,一个话语空间;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传播为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不断注入了新鲜话语,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样两个方面的互动互显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程政党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这个角度讲,探析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传播,恰可以通过活跃流变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言语大军,对其作出认知测绘。

第二,这一表达性历史行动集体行为的大方向和集体情感强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半程变化发展的总形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在:伴随着毛泽东领袖形象和地位在党内的确立,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话语权威的急速增长,“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后,中共党政军界和党领导的文化战线掀起了“拥护领袖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股热潮汇流到年度性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之际,高涨程度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显。而毛泽东新的革命话语的创设也成为持续推进这一学习热潮的动力源。再者,毛泽东思想表达传播的集体情感强度与变化发展的战争进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呈现出:战争进程发展得越快,越是顺利,离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越近,这种集体情感表达就越是强烈,越是高涨,且辐射面也就越广。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种情感表达被推向了它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点。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

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为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而其起到的心理影响作用则更不可低估。不仅如此,它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两个标志性符号。这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传播学和政治心理学角度讲,政治也可以说是一种表达、展示和辐射。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象征进行广泛动员和整合,促进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宣传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始于这一话语地带形成之初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形象和地位的传播。不过,伴随着毛泽东权威话语的丰满和成熟,出现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毛泽东”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它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后,二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互彰互显式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这种同构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旨在建立起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整套解释。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同构关系模式一再被复演和强化。至“文革”10年时期,在“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大问题上,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酿成了邓小平在1978年9月所批评的“形式主义的高举”、“假高举”^①的重大失误。

其次,它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主体意识与其政治自信和理论自觉。从政党文化建设的角度讲,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从外来移植的生搬硬套,渐进转化为内育生发的自主自觉建构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中共建党纪念活动这个平台,向党内外宣传了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业绩、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涵、科学体系和理论指导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下,这一表达传播意味着,它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理论创造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也在向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人宣示,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好事情,它不仅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已经获得独立,而且在思想上亦已独立,也就是已经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随着毛泽东思想这一象征资本的不断集中,进而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表达传播还表明,中国共产党业已改变了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术语环境,它以一整套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革命话语,完成了对不适于中国革命发展要求的“俄式革命话语”的置换。这样一种心理势能的不断积淀和发挥,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增强了其政治自信和理论自觉。

第三,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作风与其独特政党文化精神的形成。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培养人们坚守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行为方式,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在阐释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强调了加强学习、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正确的态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则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决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倡导对党内生活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时,它还大力弘扬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独特的政党文化精神。如,信仰坚定,政治忠诚;以党为荣,爱党为民;牺牲奉献,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言行一致,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及其行为方式明显具有规范作用的纪念话语,增强了个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整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四,它为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提供了文本基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主要是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产生的大量纪念文本为载体的。从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为此而写的纪念文章看,毛泽

东有 2 篇,刘少奇有 3 篇,朱德有 5 篇,周恩来和任弼时各有 1 篇。另外,陈云、张闻天、王稼祥、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吴玉章、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年度性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也都撰写有不等量的纪念文章。而基层在纪念活动中产生的这类文本则更是量多形式多样。这些纪念文本把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还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或是把毛泽东思想简化为一些通俗易懂的信条,或是给出了能为大多数人掌握和践行的具体方法,或是为宣传领袖毛泽东、传播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事实材料。这就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基础。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涵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内涵和理论指导价值。而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一种元资本,也成为支撑党和人民不断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黄晓武)